

## 聂卫平就是中国围棋的一面旗帜

常昊

聂卫平老师病逝,这是中国围棋事业的巨大损失。老师对中国围棋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执着追求围棋事业的精神,将继续影响包括我在内的围棋人、体育人。

聂老师曾在中日围棋擂台赛上取得非凡成就,使得围棋运动在全国的影响力达到了空前的地步,为中国围棋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聂老师也一直在从事围棋的推广工作,他的一生都没有离开过围棋。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围棋与日本围棋差距明显,我们处在追赶者的位子。聂老师这一代棋手,虽然整体实力不如日本棋手,但在中日围棋擂台赛上,他一夫当关连胜日本超一流棋手,为中国队夺得冠军。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刚刚改革开放不久,如何提升民族自信,体育尤其是围棋,无疑提供了这种可能。所谓时势造英雄,聂卫平老师就是那一代人心目中的民族英雄。

从进入国家队到正式拜师,我与聂卫平老师有着深厚的师徒情谊。聂老师很早就关心我了,当时我在全国同龄小棋手中成绩还不错,聂老师到上海参加比赛和活动,专门来指导过我。进入

国家队后,我得到了他更多的关心。1993年,我拜到聂老师门下,更是得到他的谆谆教诲。在他的指导下,那两三年我进步非常快。当年,我已经具备一定的实力,但感觉在不少方面仍有所欠缺。聂老师的指导,让我对棋的认识和理解有了更好的提升。1995年,我和聂老师一样,也是在中日围棋擂台赛上脱颖而出。

我担任中国围棋协会主席后,在围棋运动的发展和围棋文化的传播上,得到了身为协会名誉主席的聂老师的全力支持。有时我们认为聂老师太累了该休息一下,但他有时间就来参加比赛和活动。一方面,他对围棋很上心,谁支持围棋他都要表示感谢;另一方面,他性格豪爽,对人热忱,也喜欢热闹,虽然不在一线比赛了,但围棋元老赛等活动,他都积极参与。

聂老师才70多岁就离开了我们,令人惋惜,这让整个棋界都难以接受。聂老师代表了一个时代、一种精神和一面旗帜。他留下的围棋财富和精神力量,都将影响我们,推动中国围棋事业不断前行。

庄子的至人、神人、圣人,经由王阳明心学的内在深化和王蒙斋拳学的身体实证,从玄妙的哲学境界转化为可学可至的生命艺术。这不再仅是“无何有之乡”的精神漫游,而是“在事上磨炼”的切实修养;不再是“肌肤若冰雪”的仙幻想象,而是“神意笼罩”的身体真实。

《庄子·知北游》有言:“道在屎溺。”道的遍在性决定了逍遥的可能无处不在。阳明在龙场悟道、蒙斋在站桩求整,都是在最平常处见真章。

现代人无须逃离社会去寻找逍遥,完全可以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通过心性的觉察和身体的调整,实践“无己”

## 人间世的逍遥游

邓铭

“无功”“无名”的智慧。

当我们在键盘前凝神写作时,可以保持站桩般的“虚灵顶劲”;在会议讨论中,可以秉持“不遗是非”的开放心态;在目标追求中,可以学习“因其固然”的顺应智慧;在名利得失前,可以体认“名为实宾”的本来关系——逍遥就在这些当下片刻中悄然绽放。

庄子的三重人格理想,经过心学的内化与拳学的体化,最终指向一种整全的人生境界:以无己之心应万物,以无功之为成事业,以无名之态处人间。这或许就是现代人在纷繁世界中,既能深入生活又能保持精神自由的可行路径——在人间世实现真正的逍遥游。

“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这句古老的箴言,在今天获得了新的实践内涵:通过心性修养保持精神的超越性,通过身体修炼获得存在的真实性,最终达到既出世又入世、既高远又平常的完整人格。这就是庄子理想人格穿越两千年的现代回响,也是中华智慧为当代人类提供的一份珍贵礼物。

抗战期间,梅兰芳蓄须明志,停止舞台演出,卜居上海,拒绝为敌伪服务。他的高风亮节令人钦佩。

抗战胜利后,人们盼望梅先生早日恢复登台演出。怎奈梅剧团配角演员和场面等工作人员都在北京,一时难以以上海聚齐,因此考虑先演几出配角较少、场面简单的昆曲折子戏。1945年10月抗战胜利庆祝会时,梅兰芳首先在兰心大戏院演出昆曲《贞娥刺虎》。不久与俞振飞及其他传字辈昆曲演员,在美琪大戏院正式上演昆曲《刺虎》《断桥》《游园惊梦》《思凡》《奇双会》等剧,场场爆满。

1946年4月,梅兰芳原先合作人员已经齐聚上海,于是立即正式组班,在南京大戏院上演京剧传统剧目和昆曲。不久又转入中国大戏院进行较长时间的演出。

中国大戏院原名“三星舞台”,位于牛庄路。梅剧团在此演出后,牛庄路上就热闹起来。每当华灯初上,剧场中开场锣鼓一响,中国大戏院门前人潮涌动,路上车水马龙。剧场每天上演大轴戏时,几乎都拉上铁门、高挂客满牌。梅先生每场演出,都由电台实况转播。此时沪上许多人家的收音机也都在收听。演出结束时,剧院后台门口仍涌动着人群,希望一睹梅先生真容。一时间,上海的梅兰芳热达到了高潮。

就在此时,梅兰芳剧团却在报上发布消息称,根据惯例,梅兰芳准备在星期日加演日场,以特别优惠票价面向学界等观众。当时梅兰芳已五十岁开外,又是刚刚恢复演出,嗓音和精力都不如从前,连续每天夜晚演出已经吃力,现在又决定星期日日夜连演两场,以满足更多观众观赏的要求,真是令人感动。笔者在他首次加演日场时,曾前往观看,剧目是全本《御碑亭》。在梅兰芳演出前,还安排了两出武戏,即武生杨盛春主演的《挑滑车》和武旦班世超主演的《泗州城》,连同《御碑亭》,全场演出超出4小时,毫无“竭工”迹象。

《御碑亭》演出时,剧团主要演员悉数登场。梅兰芳主演孟月华,头牌老生杨宝森主演王有道,资深二旦芙蓉草(赵桐珊)演王淑英,小生妙香演柳春生。梅兰芳以精湛技艺、优美演唱,塑造了封建时代妇女的典型。其他演员的配合也堪称珠联璧合,精彩纷呈,全剧以“金榜乐,大团圆”收场。梅兰芳大师德艺双馨的行动在广大观众中赢得极高赞誉。

我对自己的写作一直不抱自信,也不能说自卑。我读大学的时候,在各种笔记本上写下自己对世界、对生命、对学问、对人世的认知与感怀。毕业后,我曾经试图去整理一下自己的青春笔记,尤其对其中一首小诗非常满意,甚至对自己当年的硬笔书法也暗自赞许。我想着把这首小诗投稿给《上海壹周》这样的报纸副刊,但犹豫使我拖延,直到有一天,我突然在庞德诗选里读到了熟悉的句子,两相对照,异曲同工。我这首没有标题没有写作时间的小诗,是庞德诗句的摘抄。我庆幸自己没有去投稿。

读大学的时候,我一直记得加缪在《西西弗的神话》开篇第一句就说,哲学的最根本问题就是自杀。为此买了不少生命与自杀的书,包括《自杀俱乐部》这样的小说。把一部商业片说成是最好的电影,被同学文尖嘲笑还没见过世面。自以为看破红尘看透一切,觉得走出象牙塔的生活只能是日复一日的机械重复。直到有一天我读到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中这段话,“大半的人在二十岁或三十岁上就死了:一过这个年龄,他们只变了自己的影子,以后的生命不过是用来模仿自己,把以前真正有人味儿的时代所说的,所做的,所想的,所喜欢的,一天天地重复,而且重复的方式越来越机械,越来越脱腔走板。”我再次意识到,我的一些自以为聪

敏的想法显然来自更早的阅读。读的书慢慢多了,便以为“江湖夜雨十年灯”是自己梦中得句。

我不敢轻易发表自己的文字。因为自己的所有想法不可能超出我所读的这些文字。这让

他们发现,刷视频也可以取代阅读。我就想,如果十分钟能看完《战争与和平》或者《卡拉马佐夫兄弟》,那我为什么还要去看几个小时的电影和几个星期才能看完的厚厚几大本书呢?

## 看不见的出版

王为松

我在大学四年级的时候,一心想进青年报、文艺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工作,去实习,投简历,托关系,当时一家畅销的健美杂志社来招人,我毫不犹豫地拒绝了。直到教育出版社《语文学习》编辑部来系里要一名上海籍的男生,终于让我与出版界有了托付终身的因缘。

此后我的出版经历,在《如果没有书,我会在哪里》一文里都说了。我确实是一个传统的出版人,信奉内容为王,对书店的灯光抱有幻想,喜欢看到触手可及的图书在身边有序地排列或杂乱地堆放,其实我大多数的书都是堆在地上的,因为地板比书架要大得多。

刚看到一个帖子:为了更好地推广纸质的、印刷的、以文字符号为载体的图书,出版业在过去一年拍摄了88000条视频,耗资5000000元,极大丰富了新媒体内容,培养了1000000名忠实的视频爱好者,以及2000位忠实图书读者。不过,也让50000个图书读者脱粉,

离开出版社以后,觉得可以冷静地回看一下自己多年来的实践,重新体会与思考“我们今天如何做出版”以及“出版是什么”“未来出版的出路”这样的命题。我最初是设想,编选一本《出版的品格》,出版大家谈出版,再把自己写的有关编辑出版的文章结集一册《出版感悟录》,再写一本《阅读构成的出版史》。原以为到了新的岗位,不会像以前这么忙乱,可以有更多时间静心读书写作。不承想,自己实在不是停得下来的人。所以,有以前的同事说,我不是你现在的工作有多忙,而是你使现在的工忙起来,所以你也怨不得别人,别人不理怨你就很好了。

于是,我安慰自己,真要是自己写,又能写出多少新见来。我对出版的所有认识和感悟还能超出陈昕的七本著作之外吗?还不如集众家之所长,来探究出版的品格。就我目力所及,这些文章或讲稿,可以给后来的现代出版人一个简明的读本,让他们可以快捷地了解曾经辉煌的传统的出版的真义。这里收的文章,都是每位作者有感而发,从自己的出版实践出发,没有空泛的道理,不说虚言。所以,我选的大多是我所熟悉了解的作者,或者说是曾经打动过我的文章,让我对出版有过更深的体悟与认知。这要感谢姜华与桂保的拓展与延伸,极大丰富了选文的视角与立意。

在朋友圈看到巴金在1980年4月28日写下

的一句话:现代科学正在迅猛发展,真是前程似锦!一个人倘使不用自己的脑子思索,一个作家倘使不照自己思考写作,不写自己心里的话,那么他一定会让位给机器人,这是可以断言的。

机器的优势在于记忆容量比人要大得多,它能够博采众长,可以不断排列组合,写套路文章,人写不过它。如果是做出版的话,我们是应该像巴金这样讲真话的作家出书,还是为那些模仿巴金或者压根就是为了挣钱挣名气去排列组合所谓的文学语言弄出些花哨句式的作家呢?

从韦编三绝到编修四库,从秦始皇焚书到商务印书馆被炸。无论成与毁,这些都是看得见的出版。看得见的是器物,而看不见的是精神,是风气,是传统。2016年,著名历史学家王汎森在北大讲学时提出,要向北大深厚的中国传统和人文向度致敬,看得见的北大固然重要,但纵观北大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担任的角色,其对社会风气的带动和塑造这些看不见的部分,奠定了北大毋庸置疑的地位,而这些是无法用指标化的数据来论证的。

我一直记得巢峰同志用他厚重的苏北口音说过的一句话,东临碣石有遗篇,碣石早就没了,但遗篇还在,这就是出版的价值与功用。那么,以专业学术打造出版品牌,是看得见的出版,以社会责任引领阅读风尚,就是看不见的出版。看不见的出版,才是出版真正的品格。(本文为《出版的品格》编后记,上海人民出版社·光启书局2025年12月出版)



## 夜光杯

兜月色(插画)董培培



不禁慨叹,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世事巨变中,更怀念那份笔下流转的真实与温情。

网络时代,写信仿佛变得多此一举。一切向效率看齐,时间就是金钱,提笔写字成为“奢侈行为”。那些被邮票封存的岁月,记忆留声,笔耕石墨,书信曾经作为人类交流的重要载体,绝非仅仅记录人们对笔墨信札

## 怀念鱼笺雁书

王容

的文化记忆。譬如“冥顽不化”的我,这么多年来,固执而倔强地写信。

新年临近,给要好的朋友写信寄贺卡的习惯由来已久。怀念儿时跟同学互换贺卡的时光。家境好的就直接买成品,没条件买的大多自己动手制作,精心挑选祝福的话。我的同桌来自晋南农村,不善言辞,印象中他永远低头沉默,但他做的贺卡极其出彩——捡拾不同花色的废弃纸壳,剪出花鸟虫鱼,贴到白皮烟盒上,用圆珠笔或钢笔画出人物跟车马,栩栩如生。

想起有一次,跟母亲回上海看外婆,在五斗橱里发现一张纸,折痕清晰,纸已泛黄,上面歪歪斜斜写着几个字——亲爱的外婆

新年好——啊,我刚学写字时寄来的第一张贺卡,她竟一直保存着。心里得意又甜蜜。

前日,收到一个朋友寄来的手写信。附带精美贺卡。她说因为想说的话太多,贺卡地方有限,不如写信来得畅快。那信纸细看有暗纹,玫瑰花的一缕香味若隐若现。捧着来自地球另一端的遥远祝福,她的俏脸就在眼前。美好而感动。

现如今,还有谁会选择这种祝福方式呢?顶多转发电子贺卡,微信模式千篇一律。随手一删,杳无踪迹,甚至压根就想不起来其人其事。

开拆远书何事喜,数行家信抵千金。纸旧,情如初。每每拆阅来信,品读的同时,如同面对面侃侃而谈。曾经,作为古往今来生活见证的书信,如今逐日式微。有了记录生命中难忘的人与事的载体——白纸黑字,时光得以片刻静止或倒流,青葱岁月得以重生,真实可感。身处眼下信息大爆炸时代,写信这种最为古老质朴,却不失浪漫的文化仪式,实在值得大力提倡并加以传承。

我写了一封信,用我的亲身经历和教训告诉侄子:选配偶,最重要的是人品、性格、三观合拍。请看明日本栏。

## 十日谈

飞鸿往来

责编:郭影